

聯最堅持爭取居住自由的少數民族。〕於八月十四日，該刊第卅二期出現，報導了今年發生的搜查與逮捕事件，大都與「時事紀要」本身的刊行及傳送有關。⑫此後該刊是否將繼續定期出現，目前無法預測。復刊後的形式與前無異，仍為打字抄本，編輯人及撰稿人仍不署名。

停刊的十八個月中，蘇聯的知識份子中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沙哈洛夫公開的向民主國家呼籲，在合作與安全的磋商中勿輕信蘇共，索善尼辛被放逐，猶太移民問題引起國際反應，申請離境的文化界人士也逐漸增多。而蘇聯對國際的反應也並未真正重視。比如在陷於僵局的歐洲合作與安全會議中，蘇聯對於第三項議題，始終不肯讓步，拖延年餘。對人民間自由往來與自由互通消息一點，只准許蘇聯人民可訂閱西方讀物。⑬訂閱是可以利用郵件檢查再加以控制的，其無誠意至為顯明。

在這種種的情勢下，「時事紀要」毅然復刊，充分顯示出知識份子不畏不懼的決心。西方觀察家正注意着祕密警察的反應，是否將再引起大舉搜查與逮捕。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評論「時事紀要」復刊時作了如此分析：「如果蘇聯再大事逮捕，可知它還是將國內安全置於科學文化進步之上。進步就要容許知識領域內若干不同的意見。這也將影響到對西方的關係和日內瓦的磋商。也許蘇聯領袖能見及有歧見存在的好處，這樣可以顯示蘇聯比以前有安全感，比以前開明，比以前尊重它憲法中所保證的人權。也可以顯示它在朝向與西方建立安全關係的方向前進。也許它能見及此點。我們且拭

目以待。」⑭這篇社論的觀點大體也可代表自由世界對共產制度一般的希望，如果能實現，自是令人感到樂觀。但就過去史實來看，這種期望實現的可能，不能不令人懷疑。

註：①在此以前所出的如Phoenix及Syntax等，為綜合性文集，未能定期出刊。至一九六八年已因當局之搜查逮捕而停止。②Pavel Litvinov，已故蘇外長李特維諾夫之孫。現在美國。③Survey, No. 74—75, Winter—Spring 1970, p. 206. 英文中國郵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四日第二頁，美聯社消息。④Abraham Brumberg, "Dissent in Russia,"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4, pp. 784—785. ⑤Albert Boier, "Samizdat: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in the Study of Current Soviet Affairs", The Russian Review, July 1972, pp. 282—285. ⑥紐約時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第五頁。⑦同⑥。⑧同⑥。⑨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第二頁。⑩同⑨。⑪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九日第五頁。⑫英文「日本時報」Japan Times，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七日，第四版。第卅二期中透露了兩名文化界人士已因傳送「時事紀要」而被判刑：四十五歲的作家 Vladimir Nekipelov，被判勞工營二年，四十三歲的經濟學家 Sergei Pergov被判三年。⑬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六月廿日，第二頁。Don Cook, "Russia Grants 3 Minor Points at European Security Parley". ⑭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

波共政權三十年

畢英賢

前言

七月廿一日，波共慶祝其政權成立三十週年，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可賀的日子。

在歷史上，俄國人有一個想法，誰能控制東歐國家，誰就能主宰全歐洲。依此理論推引，誰能主宰波蘭，誰就能控制東歐國家。一九四四年蘇俄軍隊佔領波蘭全境，以其傀儡分子組織組成一個臨時政府，並着手轉變波蘭為其附庸國之一。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達會議上，史達林同意，儘快以「自

由與不受拘束」的普遍選舉與「秘密投票」方式建立一個波蘭政府。實際上，俄人却利用戰後的形勢施行木馬計。他們利用顛覆、滲透、整肅及恐怖等手段以控制通信與選舉。當時蘇俄的目標是，運用各種手段消滅一切反對勢力，而其主要對象就是波蘭農民黨及天主教會。雖然這些作為已引起波蘭人民的不滿與失望，但是共產黨徒終於如願以償。

從此，波蘭名義上雖然獨立，但其人民及波共政權本身乃是在俄共直接影響之下生存着。這是現代波蘭人民不幸的起點，也是三十年來數度動亂的基本原因。

三次動亂兩易首腦

在一九四五年，波共政府壓抑了一切反對，開始實行工業、農業及貿易國有化。一九四七年實施三年計劃，企圖藉以恢復戰爭的創傷並把經濟提高到戰前的水平。一九五〇年開始實施六年計劃，全面發展生產。

一九五二年頒行新憲法。在很多方面，與蘇俄憲法相似，事實上這部憲法係由俄共訓練出來的波共頭子們所制定的。一九五三年波共政府命令天主教會與天主教宣誓效忠國家。

一九五六年在波茲南、史特汀等城市發生波蘭工人暴動，示威反俄。這次事件的原因部分是由於政治的錯誤，主要原因是波蘭工人對低生活水平的不滿。波共不顧俄共的反對，提名戈莫卡(Władysław Gomułka)當第一書記。戈莫卡上台後，首先免去羅柯所夫斯基(Konstantin K. Rokossovsky)的國防部長之職，羅氏係一名蘇俄的元帥。同時，波共對宗教與教育方面的控制也略予放鬆。戈莫卡宣佈，不強制執行集體農場政策，大部分集體農場因此解體。知識分子的自由也多了一點，波共政府開始容許一些外國書刊、電影與音樂進口。

一九五九年的選舉之後，波共容許一些獨立分子及天主教代表加入政府組織。但是，此時波共已取銷一些一九五六年暴動後所作的讓步。此時，波共在對外關係上遵循蘇俄的路線，在內政上已獲得一些自由。一九六八年騷動再起，在九個城市中，波蘭學生要求更多的公民自由。波共却把這次學生動亂歸罪於知識分子與猶太人。

一九七〇年底再度發生大規模的暴動。十二月十四日在波蘭北部瀕臨波羅的海的格但斯克(Gdańsk)，列寧造船廠的工人首先舉行罷工，然後格但斯克工業大學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他們抗議物價上漲，要求增加工資。其後，在格丁尼亞(Gdynia)、索波特(Sopot)、西塞辛(Szczecin)及斯魯匹斯克(Słupsk)亦相繼發生類似的示威運動。事變之初，除波共採取斷然措施與武裝鎮壓外，蘇俄亦陳兵界上，俟機而動。抗暴運動雖未能全面發展，但已使波蘭全國震盪，其對共黨政權所包涵的危險性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抗暴反共運動。最後，波共不得不向人民低頭，向工人保證提高工資以對消糧食上漲的影響。戈莫卡亦「因病」辭職，由吉瑞克(Edward Gierek)接任。至此，這一動亂才算平息。而波共的黨政人事與政策也隨着發生重大調整。

一九七〇年事件之後

自從戈莫卡下台之後，在波共的上層領導中發生了重大變化，波共在政策方面的更張也是勢在必行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波蘭工人黨」(即波共之正式名稱)召開了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批准了人事與政策方面的變革。一九七二年三月中，舉行全國性的國會選舉，接着組織了新政府。至於在吉瑞克領導下的波蘭對外政策方面，蘇俄雖然不很高興，但還是相當滿意。

波共黨中央在一次報告中，除了正式批准政策方面的更張，同時對過去的經濟計劃制度與高層管理施以嚴厲的批評。批評要點如下：(一)忽視業已凍結的工資水平的重要性；(二)在執行黨中央決議時缺乏督察；(三)管理制度不當，致引起「不正確」解決問題方案；(四)違反幹部政策，祇注重次級事務；(五)繼續使用業已導致矛盾的傳統的計劃方法；(六)黨領導對細微末節小事皆自行策劃，使政府失去其管理的權職①。

雖然上述批評乃是針對戈莫卡執政期間的波共與波政府而言，而新組成波共領導的成員皆脫不了關係。有人批評現在的波共領導組織乃是新瓶裝舊酒。

在工業方面波共所作的基本調整包括：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增加肉類、豬油、可可、水果等之進口，增加出口水平，進口更多之輕工業原料，更加

注意社會的需要，增加建設住宅經費。

在農業方面波共取銷強制交納農產品並提高食品批發價格。簡化法規，使沒有繼承人之農民於退休時便於把土地轉移至國家農場、國營農場或其他農業組織。免費醫藥服務擴及鄉間。

在新措施中，最顯著者是農業方面的改革，這是有原因的。自從波共當政以來，由於耕作方法陳舊，國家經濟發展偏重重工業，農業投資不足。加之農產品收購價格過低，農民無法積蓄足夠資金以改善生產方式。因此，農民雖能自由經營，但並未獲得較佳成果。

新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五年）係由戈莫卡草擬，吉瑞克上台後予以修改，第六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經新國會討論後完成立法。與前一個五年計劃比較，其投資總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三。投資結構也作了調整，已不過份偏重重工業。在人民日用必需品工業方面，包括住宅建造工業，其投資額增加至二倍。在農產品方面，農耕作物預計增加百分之十七—二十；畜牧產品增加百分之十九—二十一。波共認為，這是五年計劃的關鍵問題之一。工業產品預計增加百分之四八—五〇，產品之結構也有了重大改善。波共預計，在五年內，人民實際所得將提高百分之七一—八二。

波共在經濟政策上所作出的修正，乃是向現實低頭。事實證明，以往的政策未曾產生共產黨徒所預期的結果。相反的，把國內經濟越搞越糟，終使波人民以行動作出抗議，波共才不得不讓步。

目前的經濟概況

自從波共實施新五年計劃以來，確實是有了一些進步。難怪近年來，波共頭子們經常誇述波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成就。今年七月底，在一篇慶祝波共政權成立三十週年的文章中，波蘭部長會議主席雅羅謝維茲(Piotr Jaroszewicz)說：「在社會主義波蘭的多方面的成就中，最近四年中所獲致的社會經濟的成果佔有特殊地位③。」他特別提出波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中波共確定了新的政策路線方針與發展國家社會經濟的新戰略。

波共頭子吉瑞克在慶祝波共政權三十週年的演說中也說：「從開始實施第六次代表大會所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戰略以來，三年半內在各勞動部

門與人民生活發展上見到了重大的成就④。」

在過去三年（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三）中，波蘭的發展確實是共黨執政以來少有的。在這段期間內，國民總所得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九以上。三年中工業生產共增加百分之三十六，農業生產將近百分之十九。與一九七〇年比較，一九七四年的平均實際工資共增加百分之十八；易言之，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間，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七·六⑤。按照波共的估計，今年的實際工資平均將增加百分之八左右⑥。

當然，這些成就不能證明，波共政權下的積弊業已消除。事實恰恰相反，很多「不當」情形依然存在，諸如：對原料與材料的管理不當與無效率，市場貨品生產與勞務發展太慢，投資分佈不妥與拖延，運輸工作有問題；此外，各級經濟與組織活動也多有值得嚴加批評之處⑦。具體地說，波共所面臨的難題尚有：不到工者（每天約有二萬人），未完成計劃，生產成本過高（單以浪費之原料計算每年約損失一百億波幣，一〇〇個波幣約等於二十五美元），產品品質粗劣。以一九七三年初計算，未完成的計劃達三千九百億波幣（Złoty）。工人反對完全禁止或限制怠工，例如，在格但斯克港口有四十多個碼頭工人要求與經理部門開會討論應否因使用省力機器而裁減勞工。

農業生產在整個市場與經濟平衡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儘管波蘭近年來農業有進展，但仍需進口糧食，在一九七一一—七三年曾從蘇俄購入五百萬噸、向資本主義國家購進四百萬噸糧食（波蘭現有人口約三千三百萬人）。今年波蘭氣候不佳，能否達成預定生產尚難預測。農業機械也是一個難題，按照一九七一一—七五年的五年計劃，農業機械每年可增產百分之二十，但是供與求兩者之間的距離依然很大。

此外，在對外貿易方面，波蘭已開始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其輸出者大部分是原料，極小部分其他商品；輸入者大部分是現代機械、裝置、成套工廠及其他技術等。以一九七三年為例，波蘭的工業產額佔世界工業產額的百分之二，而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二·二。波蘭工業生產佔世界第十位，而出口額却接近第二十位。與一九七〇年比較，一九七三年依人口計算的出口額已增加一倍，但遠在東德、捷克、匈牙利及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之後⑧。

與蘇俄的關係

在蘇俄集團中，波蘭對蘇俄唯命是從，它不僅參加了華沙公約組織，也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忠誠的一員。在國際舞台上，祇要是蘇俄所提出的政策，波共一定支持。蘇俄與波共之間至今尚未有任何公開的歧見。相反的，克里姆林宮的頭目們對波蘭新領導所表現的忠誠似乎相當滿意。

波蘭與蘇俄的貿易額不斷增加。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間，總值是五十六億盧布；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間增加到九十三億；在現行五年計劃期間，其總額預計為一百三十四億。波蘭與蘇俄間訂有合作生產電子計算機及飛行器之協定。同時，約有一百八十個蘇俄的和一百三十個波蘭的研究、計劃和設計組織在科技方面聯合工作；同時也有三十三個蘇俄的和十八個波蘭的政府機構聯合工作。波蘭在紙漿、冶金、石棉和鍊企業諸方面協助蘇俄⑨。波蘭同蘇俄以外的其他國家的關係，也是以蘇俄總政策為藍本；與其他附庸國家關係亦然，在對中共匪黨關係上特別顯著。

七月廿一日波共政權在華沙舉行擴大慶祝「社會主義波蘭三十週年」。在慶祝儀式中，波共頭子吉瑞克特別當布里茲涅夫的面表示對蘇俄的忠誠與感激。他說，在世界上波蘭地位的基本的先決條件乃是同蘇俄作階級與國家的聯合，「這給予我們波蘭一切利益以有力的與恆久的保證，使它在建立國際安全與和平上扮演重要角色，使它加強自己的聲譽」⑩。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其大會致詞中特別強調：「談到我們的國家，我可以說：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經常摯誠期望波蘭成爲一個強大的、獨立的、民主的國家⑪。」他的這些話自然引起「如暴風般的掌聲」，但是這種「摯誠期望」含有多少誠意，是令人懷疑的。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屢見東歐國家的人民反抗共黨統治的起義運動，蘇俄自然不會掉以輕心，因此在東歐集團內駐有三十一個蘇俄陸軍師，相當於其地面戰鬥部隊總兵力的五分之一，最近其兵力有增強趨勢，其目的決非僅僅是對付西方。

前途展望

同樣原因而下台，由吉瑞克領導波共。吉瑞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把波蘭的經濟置於一個較健全的基礎上。爲了如此做，他必須忽視一些馬克斯主義教條。除了容許私耕農外，波共政府暫時不取消獨立手工業與私人企業。這些措施也許祇是權宜措施，一旦波共不再需要私人企業支持其經濟時，這些措施將會更張。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是工業工人以及他們對波共政權的態度。每次廣泛的罷工皆是對波共政權的警告。事實上，吉瑞克業已宣佈其政權的目標在改善生活水平，戈莫卡曾經也這麼作過。危險就出在這裏。當波蘭與西方世界增加接觸，人民的要求將會繼續高漲；但是，由於其經濟制度的不健全，波共難以滿足這些要求。

波共在經濟領域內雖然對波蘭人民作出明顯讓步，但是並沒有因此帶來自由化與民主化。但是在工業工人中，仍有很多人認爲，他們有力量迫使政府改變或取銷一些決定。在東歐，這是一個新發展。

另一方面，如果新危機發生，其後果難以預測。但可確信，吉瑞克可能與像戈莫卡一樣利用鎮暴警察、甚至特種部隊以鎮壓示威者。如果不這樣做，將會導致全國性的騷動，結果將會給予蘇俄武裝干涉的口實，像它干涉捷克一樣。這一潛在的危機也許會使波共政權與波蘭人民相安一段時間。

註①「波共第六次代表大會」(Warsaw: Księgizna i Wiedza, 1972)第七—七七頁。

註②「消息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

註③「消息報」，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註④「消息報」，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⑤波部長會議主席雅羅謝維茲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九日對國會之講詞，十九日格林威治時間一七·二五時華沙電台播出。

註⑥波「人民論壇報」，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⑦一九七四年二月華沙電台播出。

註⑧同註⑥。

註⑨俄「社會主義工業」，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第三頁。

註⑩俄「消息報」，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⑪同註⑩。

前波共頭子戈莫卡因工人不滿低下生活水平起而暴動而上台，其後又因